

「史記疏證」抄本情況及其作者考畧

劉起鈞

日本著名的「史記」研究學者著有「史記會注考證校補」巨著的水澤利忠教授，於一九八七年「文教大學國文」第十六號上，發表「十萬卷樓舊藏靜嘉堂文庫藏『史記疏證』作者考」一篇鴻文，首次進行了對這一珍貴寫本的考論，並提出了此書作者非過去有人所誤傳的沈欽韓，而考定是乾隆時的杭世駿。這一論斷是精確的，卓越的。引起了我對此書的興趣。水澤教授文中還提到顧頡剛先生也會藏有此書的抄本，因此託我回國查找。我從日本回中國後，經過探尋，獲得了有關此書抄本情況的一些了解，現在即就所知者向學術界提出。

一、抄本情況

「史記疏證」原是一部未署撰人名氏的清代著作，計共六十卷。原無刊本，只有抄本傳下。現在所能見到的清代抄本共有三本，一即十萬卷樓舊藏今爲日本靜嘉堂文庫所藏之本（簡稱靜嘉堂本），一是顧頡剛先生所得信

芳閣舊藏今爲中國社會科學院文獻情報中心顧頡剛文庫所藏之本（簡稱顧氏文庫本），一是海寧蔣氏舊藏今爲北京圖書館善本室所藏之本（簡稱北圖本）。三本格式、內容、卷次都相同，雖文字彼此稍有訛脫歧異，並不影響它們來源於同一本。特別如卷四十六「魯仲連鄒陽列傳第二十三」條下，顧氏文庫本和北圖本都空出十三行無文句，靜嘉堂本雖不空行，而眉批注明云：「仲連列傳下疑有總論一段，原本空十三行寫起。」可知此三本當據同一原本或同一原本的傳抄本，所以成爲總的情況相同的三本。

此三本却有兩個顯著的不同之處，一是在卷一之前（可稱卷首，但原書未標此稱），靜嘉堂本錄有「敘例」（即顏師古「漢書敘例」中的「注釋名氏」部分，而又不全），顧氏文庫本及北圖本皆無之。又一是在靜嘉堂本全書各卷大都有不少眉批，對「疏證」內容多所裨益，顧氏本北圖本亦皆無之。這是靜嘉堂本優於彼二本處。然三

本皆在卷首錄有「正義謚法解」，惟靜嘉堂本脫其前半，而似「敘例」當其處。由這些，似可推知顧氏文庫本與北圖本更較接近，當是同一原本三抄本，靜嘉堂本則可能是再抄本，即是據一有眉批之本再傳抄之本。因該眉批對「疏證」原文有補充，有訂正，亦有質疑，顯係另一位對「史記」亦有研究之學者所加，而靜嘉堂本的抄手表現出對一些普通文史知識有所不足，出現一些不應有的文字訛寫，如「庶乎近之」訛作「庶子近之」，「劉向新序」訛作「劉南新序」，「干寶搜神記」訛作「子寶搜神記」，等等。可知那些眉批決非此本抄者所能題寫，而只是抄錄一本已有眉批之本，這就顯然非據最早原本了。

靜嘉堂本無題記、無序跋、無印鑒，就只是原書正文的抄本，只是和「漢書疏證」合綴在一起，因此對其情況一時無法作多的了解。可知者，此本全書非一人抄寫，而出自衆手。大抵卷一卷二兩卷爲一人寫，是頗流麗的行書而稍帶點潦草，卷四卷五兩卷爲一人寫，字最工整，而豐腴秀麗，書法之美爲全書之冠。卷六至二十三、卷三十三至三十八、卷四十三至五十三、共三十五卷，爲一人寫，字體比全書其他各卷爲小，而筆致流暢秀麗，成爲本書主體。卷三爲一人寫，字體工整而書法

水平不高，卷二十四至三十二共九卷爲一人寫，卷三十九至四十二共四卷爲一人寫，卷五十四至五十七上半共三卷半爲一人寫，卷五十七下半至卷六十亦三卷半爲一人寫，則大部頗潦草，字亦不佳。合觀之，全書由抄手八人寫成，不似顧氏文庫本和北圖本大抵由一人以較工整楷書寫成。（顧氏本始終爲一人寫，中間似有很少幾頁爲他人換筆。北圖本全書字跡大體一致，但中間先後有幾卷顯然字跡稍異，但沒有改變全書總的風貌。）

由於此本原藏者歸安（今吳興）陸心源輯刊有「十萬卷樓叢書」，因而十萬卷樓遂成爲其藏書樓的總稱。其實他擁有的宋元刻本及珍貴手抄本皆特藏其皕宋樓中，一些明清佳刻本藏其守先閣中。由是可知此本「史記疏證」原來當藏於十萬卷樓藏書家的皕宋樓中。經查閱陸心源的「皕宋樓藏書志」雖載了不少宋元善本及名抄本的有關情況資料，但獨缺「史記疏證」一書，因此未能對此本的來源及情況作更多的尋索。大抵當時各藏書家，其豐富的典藏除來自購獲外，在藏書家彼此之間也常互相借抄，或在社會上獲知某佳本而設法抄存，所以有好些抄本，大都是藏書家僱人所抄。

最後，這位清末四大藏書家之一的歸安陸氏所有藏書，是在一九〇七年由其子陸樹藩售與日本人大企業家

岩崎氏，故入藏於具靜嘉堂文庫了。

顧氏文庫本書前有顧頤剛先生題記云：

一九五四年以十八萬元得於上海修文堂書肆，書無序、跋，亦無作者姓名，不知是沈欽韓歟？宛峯見此謂是宿遷王氏故物。是年十月顧頤剛記。

王氏物於抗戰前散出，為北京邃雅齋書肆以數萬元得之。頤剛又記。

書中「秦楚之際月表」下云：「愚以乾隆五年直武英殿，與華亭王祖庚同撰此表。」得此綫索，或可尋出作者。

這裏說明了此本的來歷，並提出了推尋作者的綫索。關於作者問題下面再談，此處談此抄本的來歷。顧先生據宛峯先生告知為宿遷王氏故物，「宛峯」為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張政烺先生別號。因此我去問宿遷王氏為何人，張答以當時曾為顧先生查找後告之，今已相隔數十年，忘其為何人。只知王氏藏書約於一九三六年間售與北京舊書肆，其藏書特點是用藍布函藏，只有函面函底有硬襯版，書兩側皆為軟藍布，在顧先生處一見此書如此，即知其為王氏故物。我即至社會科學院文

獻情報中心訪尋此書，則現已由社科院裝以新的硬布盒，原裝函套已不可復見。我承張先生所告諸語，即往尋「宿遷縣志」，冀獲王氏踪跡。只見到清代較早期所修該縣志，無法找到此宿遷王氏為何人。經仔細看顧氏文庫本，在其正文首頁發現鈐有「王氏信芳閣藏書印」圖記，從「室名別號索引」查知信芳閣為「嘉興王相」室名，以為非宿遷，與此不相應。嗣在社科院文獻情報中心閱覽室偶查「明清江蘇文人年表」，乃獲見宿遷王相，字惜庵，乾隆五十四年（1789）生，道光二十年（1840）卒，著有「無止境齊存稿」、「井窺」、「鄉程日記」、「春明途說」、「草堂隨筆」等書，輯有「信芳閣詩匯」、「國初十家詩鈔」（以信芳閣名義刊）、「王氏家集」、「友聲集」等巨帙。而後如獲知宿遷王氏的一些情況。他藏書豐富，還藏有一部未著撰人名氏的「漢書疏證」抄本，後亦為顧先生所得，今亦藏社科院文獻情報中心顧氏文庫，（下文再談到）。其書內除鈐有與「史記疏證」首頁相同的「王氏信芳閣藏書印」圖記外，其內頁復有「秀水王相」「惜庵」二印，則知王相原來祖籍秀水，而秀水屬嘉興，於是始去查閱光緒五年刊「嘉興府志」，在「文苑」傳內載明王相祖王錚為秀水人，曾任宿遷歸仁集的巡檢，因此王相父遂定居宿遷，以開質肆（當舖）致富。又說王相「能為詩古文辭」，但「以經濟咨諮

侯」顯然與地方大吏以金融貿遷往來，必更增其財富。但終究他是能讀書著書的人，所以最後「倦遊歸，營百花萬卷草堂，閉戶嘯歌，有『無止境存稿』」。顯然他的「信芳閣」就是他的「百花萬卷草堂」。他以巨富而做藏書家了。王氏死後，他的後代還能保存其藏書歷百年之久，至一九三六年始散出，視十萬樓樓主人陸心源死後不久，即被其不能克家承業之子敗壞父業，全部十餘萬卷珍藏悉行出賣，大有高下之別。而事亦有難一般而論者，王氏信芳閣舊藏散出後大部不知去向，陸氏十萬卷樓包括碩宋樓守先閣舊藏歸於日本靜嘉堂文庫，完整典藏至今，學者取讀方便，我即曾至該文庫盡閱與自己研究有關的經典古籍珍本，快慰交感於懷。可見諸家藏書，從各方面體現其有幸有不幸。今看到信芳閣所藏的「史記疏證」、「漢書疏證」二書抄本都獲入藏中國社科院內的顧氏文庫，對學術來說，亦是稱慶的幸事。

北圖本「史記疏證」書前有海寧蔣光燾題記云：

考仁和邵位西先生懿辰所著「簡明目錄」有「漢書疏證」二十四卷，云國朝沈欽韓著。此書既與「漢書疏證」連續合鈔，且行欵體例亦復相同，當亦欽韓作也。二書舊不題名，因於檢書

之餘，表而出之。

此段題記之末，鈐有「光緒甲申海寧蔣光燾命子望曾檢書記」陰文篆體方印。始把「舊不題名」的此兩抄本都推定為沈欽韓作。這點影響頗巨以後一些目錄即著錄此書為沈作。將於下文再談，現在先弄清蔣光燾其人。

學術界過去一般知道因輯刊有「別下齋叢書」、「涉聞梓舊」這兩部叢書名集而有名的蔣光煦，是海寧藏書家，而對蔣光燾之名較生疏。觀兩人同為蔣氏光字輩，名字都從火，按中國命名習慣，當是兄弟輩。經查一九二一年刊的「海寧州志」、在「人物志·文苑」中有蔣光煦傳，在「藝文志·著述」中有蔣光煦、蔣光燾簡述及各人著作，兩人之子又都以「學」為輩名，益足證兩人為兄弟輩，不過州志中未予說明。蔣光煦號生沐，諸生，候選訓導。就是說一生沒有科舉功名，沒做過官，但藏書五萬卷，除輯有上述兩大叢書外，還輯有「別下齋書畫錄」、自己著有「東湖雜記」、「輯補偶錄」、「花樹草堂叢稿」，咸豐時避兵亂死荒村。蔣光燾字寅舫，貢生，候補大理寺評事。武昌張裕釗說他：「好讀書，藏圖籍數十萬卷。」（不知數字有誤否）。竝說他於太平天國時，「出走海上，浙江以至於楚，轉徙江漢之間，然必以其藏書自隨，不少時委去，蓋好之至」。可見他藏書不少，而且逃亡時還隨身帶

着所喜愛的。恐要有所散失，可是如上引題記，他在光緒甲申（1884）時，太平天國革命已成過去，他仍得優閑自在地在家裡帶着兒子欣賞和清理藏書。但未見他輯刊叢書，自己則著有「敬齋雜著」和「詩小說」兩種。後見楊立誠等編「中國藏書家考畧」，有蔣光燁很簡畧的小傳，主要引錄了張裕釗那幾句，僅多出了兩點，一是說他爲蔣光煦的從兄弟，一是說他藏書的「衍芳草堂書目」爲其孫所寫。這些就是這位藏書家的簡況。

蔣光燁不僅藏有「史記疏證」抄本，還藏有一部「漢書疏證」抄本，現亦藏北京圖書館善本室，我也去借閱了。此抄卷首亦有蔣光燁題記，首行大書「國朝沈欽韓著」。次行以下去：「邵位西先生『簡明目錄』眉端語曰：漢書疏證二十四卷。則此書爲卷二十七，或欽韓傳稿有二，或過錄邵書者偶誤七爲四，俟考。」雙行小注：「邵云何子貞藏有抄本。」在題記之末，同「史記疏證」一樣鈐有「光緒甲申海寧蔣光燁命子望曾檢書記」方印，又在正文第一頁右下端鈐有「鹽官蔣氏衍芳草堂二莊藏書印」圖記。因海寧在三國孫吳時稱鹽官縣，故有此稱。

蔣氏藏書不知何時散出，今其所藏「史記疏證」、「漢書疏證」兩抄本都入藏於北京圖書館善本室，各爲十冊，不詳北圖從何而得（我曾函北圖負責人詢問，未得復）。據

「四庫簡明目錄標注」、在「何子貞家藏有抄本」句下，續云：「振綺堂有史記、漢書疏證各十冊，抄本。」如係邵懿辰原所記，時間畧早於蔣光燁，是爲此二書又一抄本。但蔣光燁引用邵位西之說時，只知道有何子貞家藏本，而未見云有振綺堂之本，則顯然爲邵後人、邵章之所記時間後於蔣光燁，則很可能與蔣藏本有關。雖然僅據冊數相同來談，難以定論，但此書流傳抄本原就不多，而流傳各抄本之冊數往往各不相同，顧氏文庫本「史記疏證」爲八冊，靜嘉堂本爲十六冊，而振綺堂與北圖所藏同爲十冊，似乎不一定純出偶合。按振綺堂爲乾隆時錢塘汪憲藏書處，至宣統時錢塘汪康年輯「振綺堂叢書」，是亦傳世顧久的藏書者。而錢塘與海寧當時同屬杭州府，相去甚邇；「中國藏書家考畧」載汪康年於光緒時，壯遊南北，數於書肆搜覓祕書，則就近搜得海寧散出之書，非無可能，不過現在無確切綫索可尋了。

總之，此「史記疏證」、「漢書疏證」二書抄本，其宿遷王氏所藏者，經過分散流傳，現都已典藏於中國社會科學院文獻情報中心顧頡剛文庫了，海寧蔣氏所藏者，經過轉徙後，現都已典藏於北京圖書館善本室了；歸安（吳興）陸氏所藏者，經過船舶而東，現都已典藏於日本靜嘉堂文庫了。

二、作者考畧

「史記疏證」、「漢書疏證」二書抄本，原都未署撰人名氏，蔣光燾始據邵懿辰著錄另一部「漢書疏證」刊本爲沈欽韓所著，遂推定此「史記疏證」抄本亦爲沈欽韓所著。他推定二抄本爲一人所著是對的，說是沈欽韓所著，則錯了。後來靜嘉堂文庫的「漢籍目錄」著錄「史記疏證」寫本爲「清沈欽韓撰」，顯受此說影響，同樣錯了。

水澤利忠教授的論文中周詳論證「史記疏證」爲杭世駿所著，是完全正確的。文中引證確切，列舉了武英殿本「史記考證」中「臣世駿案」之文，以及收入杭氏著作「道古堂外集史記考證」之文，與「史記疏證」相應之處比勘，發現其文字完全一致（或畧改易一下），只是將殿本的「臣世駿案」，到「疏證」中改稱爲「愚按」。這就以無可辯駁的鐵證，肯定了「史記疏證」爲杭氏所著，成爲不易之論了。

水澤先生文中還列舉了六種有關杭世駿的傳記中所載杭氏著述書目，其中四種說杭氏著有「史記考異」（「異」或作「證」），「漢書疏證」（其中有一種作「兩漢書蒙拾」），有兩種（「文獻徵存錄」和「清代樸學大師列傳」）則明確載杭氏著有「史記疏證」、「兩漢書疏證」及「北齊書疏證」。而

朱記榮「國朝未刊遺書志畧」亦載有杭世駿「漢書疏證」爲未刊遺書。可知清代已有幾家記載杭氏著有「史記疏證」、「漢書疏證」者。最近看蔡冠洛編「清代七百名人傳」，其杭氏傳中先畧舉了杭氏有關史學諸著作，然後列舉杭氏著作之已刊行者，計有：「道古堂文集」、「詩集」、「漢石經考異」、「諸史然疑」、「兩漢蒙拾」、「晉書補傳贊」、「文選課虛」、「續方言」、「榕城詩話」、「三國志補注」、「質疑」、「詞科掌錄」及「續禮記集說」諸書。其「金史補」原百餘卷，殘存五卷藏江南圖書館。「餘若「史、漢、北齊疏證」及「歷代藝文志」、「兩浙經籍志」、「續經籍考」等遺稿，均散失不可得矣」。亦肯定杭氏著有「史記疏證」、「漢書疏證」等稿，只可惜都已散失不可得了。何幸現在看到還流傳下來有「史記疏證」、「漢書疏證」的抄本各三部（「漢書疏證」還另有一抄本，原在北京人文科學研究所，下文再談到）。而且得到水澤利忠教授考定其中「史記疏證」即杭世駿所著，這真是學術上最堪慶幸和最有價值的事。

再根據顧頡剛先生在「史記疏證」卷首題記中所提綫索進行考索，更可有力確證水澤先生論定杭氏所作之說的精當。顧先生引本書作者在「秦楚之際月表」下云：「愚以乾隆五年直武英殿，與華亭王祖康同撰此表。」這

是作者非常明確的自白，弄清楚誰在乾隆五年和王祖庚同直武英殿，這作者問題也就解決了。

清代文籍如「文獻徵存錄」、「碑傳集、作者紀畧」及龔自珍「杭大宗逸事狀」等記杭世駿生平，今據記載較詳的「清代七百名人傳」所載云：「杭世駿，字大宗，別字董甫，浙江仁（今杭州）人。家貧力學。……雍正二年舉人。乾隆元年，召試博學鴻詞，授翰林院編修。校勘武英殿十三經，二十四史，纂修「三禮義疏」。……在館閣嘗自「永樂大典」鈔輯宋元以來諸儒「禮記集說」數百卷，以續宋衛正叔（湜）書。」是杭世駿自乾隆元年起以翰林院編修直武英殿校勘纂輯經史諸書。據「清史稿·選舉志」載，乾隆元年試博學鴻詞科，取一等人五人，杭世駿在內，授編修，以官書記載證實了杭氏自乾隆元年起直武英殿。而當時他們擔任經、史諸工作，經在前期，史在其後。據乾隆十二年二月「御製重刻二十一史序」中說：「朕既命校刊十三經注疏定本，復念史為經翼，併校校讎以廣刊布。……『明史』先經告竣，合之為二十二史。」可知校刊十三經和「明史」之後，接着校刊二十一史。而和碩和親王在乾隆十一年奏上校刊二十一史告竣的表文中說：「經七年之寒暑，次第成書，則至遲當目乾隆五年開始二十一史工作。正與作者在「秦楚之際月表」

下所說「乾隆五年直武英殿與華亭王祖庚同撰此表」時間相合。而奏報二十一史校刊告竣的表文後附有「校刻二十一史諸臣職名」。首列「監理」為和碩和親王，「總閱」為鄂爾泰與張廷玉，接着列「總裁」六人，張照為首，

李清植第二，又接着「提調」四人，陳浩為首，孫人龍第四，然後為「編校」二十八人，沈德潛為首，齊召南第七，杭世駿第十九，王祖庚第二十六。按「清史稿·選舉志」所載乾隆元年的博學鴻詞科，杭世駿以第一等授編修，齊召南為第二等，授庶吉士。而另據傳記，沈德潛、王祖庚都參加此鴻博試而落選。是齊、沈與王原來皆在杭之下。但沈以乾隆四年成進士，授庶吉士，年已六十七。乾隆七年散館時，乾隆以沈為「江南老名士」而授編修也直武英殿。不久升內閣學士，又擢禮部侍郎，遂成「編校」之首。齊召南則於乾隆八年由御試翰詹各官，擢中允，遷侍讀。所以官位也高於杭了。因此杭直武英殿實際接近的是王祖庚。王是康熙時武英殿大學士，編纂「欽定書經傳說彙纂」的王項齡之孫，雍正時進士，應鴻博試落選，遂為候補主事，實任山西隰州直隸州知州，可能由於項齡之後并曾與鴻博試也調查武英殿參加經史校刊工作。下文還要提到王祖庚在「史記」的考證條文有些是杭代筆或共同研討寫成，就可杭與王在直武

英殿時切磋的密切，那麼在編校工作中，與王祖庚同撰「秦楚之際月表」的，必然是杭世駿無疑了。

由水澤利忠教授的考定，再由作者是與王祖庚於乾隆五年同在武英殿這一事實的佐證，「史記疏證」之由杭世駿著於乾隆初年，已是鐵的事實。而蔣光燾竟任意推定那位出生於乾隆四十年的沈欽韓，竟是寫成於他出生前三十多年的一部書的作者，是過於輕率的。

蔣光燾之誤，是由於他分拾辨不出和「史記疏證」合抄在一起的「漢書疏證」，同沈欽韓著的「漢書疏證」是根本不同的兩部書。顯然這位藏書家沒有同時收藏這兩部書，以致未曾比較就率意以爲是一書。其實他只要翻一下內容，看到乾隆五年直武英殿這些事，就不應把作者扯到生活在嘉慶時而且只中過舉人根本沒有到過武英殿的沈欽韓頭上去的。

不僅清代的「文獻徵存錄」、「國朝未刊遺書志畧」以及「清代七百名人傳」等都已明確記載杭世駿著有「史記疏證」、「漢書疏證」二書，因而所發現的此二書三部抄本二者合在一起，即杭氏自己在這兩部書裡也都互相注明在同時撰作這兩書。如「史記疏證」卷五十六張湯傳「乾沒」條下「疏證」文云：「詳見漢書疏證」。而在「漢書疏

證」卷一高帝紀的「姓劉氏」條下「疏證」文末注明云：「詳見『史記疏證』」。可知他在撰寫此一部「疏證」時，同時在寫另一部「疏證」。雖然此二者最後成書可能有先後，而其動乎着筆經營初稿大抵是在同一時期內進行的，即都在乾隆前期。

孫殿起「販書偶記續編」中載：「漢書疏證二十七卷，不著撰人姓名，舊抄本。日本昭和十四年（1937）影印本，最後有吉川幸次郎題識云：是書引前人之說，至齊召南、趙一清而止，殆乾隆間人所作。」吉川氏推斷爲乾隆間人，是很正確的，水澤先生進而考定是乾隆間的杭世駿，從此爲此書作者提出了定論。

顧氏文庫所藏「漢書疏證」抄本前顧先生題記云：「此爲廬江劉晦之先生藏書，甲午（1954）春，其書散出，予得之。取校日本，昭和十四年吉川幸次郎等縮印本，筆迹對若畫一，知出一人之手，而挑逗長短，筆畫繁簡又畧異，知爲一人前後所書也。此書不著撰人名氏，而當時北京人文科學研究所及劉先生同時得兩本，誠顯晦有時矣。予今本（年）眼始花，得此大字本展卷不費刀，爲之欣忭無已。願得暇間將「漢書」好好讀一過，庶不負昔賢之苦心也。一九五四年八月，頤剛記。」上文已說明，此本也是王氏信芳閣舊藏，顧先生這一年分別從上海修文

堂和盧江劉氏得到從信芳閣散出的這兩抄本，可稱幸事。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此「漢書疏證」抄本竟和吉川幸次郎影印所據之本出于一人之乎。據「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分類目錄」載：「漢書疏證」二十七卷，清闕名撰，昭和十四年京都吉川氏等用北京人文科學研究所鈔本影印，漢書補注未收書之一。所以顧先生據吉川氏影印本而讚嘆北京人文科學研究所得到此書。按，北京人文科學研究所藏書，今歸中國科學院圖書館典藏，因此我到該館借閱此原抄本，但查盡其幾套卡片目錄而不見，只見到吉川氏影印本。最後向其管理人員借閱其館內所藏原始「北京人文科學研究所藏書目錄」，始知戰後國民黨政府接收北京時，此原由日人所辦的人文科學研究所自然亦予接收，將其重要珍本善本皆取走。在該目錄中所取走的書名下皆寫明「提京」二字，幾乎每頁都有注明「提京」者，一頁至少必有一或二本。而「漢書疏證」二十七卷不著撰人名氏稿本」的下端，正注「提京」二字，始知此本當時已調歸南京，後即携往臺灣，今當藏臺灣中央圖書館，今大陸只能見到該書的吉川氏影印本了。

今取中國科學院圖書館和中國社會科學院顧氏文庫兩處都藏有的光緒二十六年刻沈欽韓「漢書疏證」三十六卷刊本，與兩處都藏有由一人所寫的「漢書疏證」二十七

卷抄本對照以觀，則明為兩部完全不同的著作，只是書名相同，內容文句都判然各異。當時北京人文科學研究所兩書在手，判別容易，所以把浙江刊三十六卷本標明為「清沈欽韓撰」，把清抄二十七卷本標明「不著撰人名氏」。由上文所考述，這「不著撰人名氏」的「漢書疏證」原來正是杭世駿所著，從而和它連在一起的「史記疏證」也正是杭世駿所著，所以今能發現此二者合在一起的抄本這三部之多。可知這兩書原就是杭世駿一人之作，因而連在一起傳寫的，正像後來沈欽韓一人所作「漢書疏證」後漢書疏證連在一起刊行一樣，蔣光燁在這兩書作者問題上製造的混亂，現在可以澄清了。

三、「史記疏證」採用「史記考證」的情況證其作者為一

水澤利忠教授首先用「史記考證」和「史記疏證」相比勘發現「考證」中的「臣世駿按」文句，移到「疏證」中改為「愚按」，就確證了「史記疏證」為杭世駿所撰，這是一重要的有決定意義的發現，為解決「疏證」的作者問題找到了鐵證。

現在再進而全面尋究「史記疏證」採用「史記考證」文句的情況，益足證實兩書全由杭世駿所撰。

武英殿本二十三史(後增「舊唐書」、「舊五代史」爲二十四史)每書各卷之後，都附有編校諸臣所撰的「考證」條文。「史記」全書共有考證1482條。(其中卷十六「秦楚之際月表」、卷十七「漢興以來諸侯年表」、皆另製一新。

表，各作爲一條計)。而其中「臣世駿按」計有27條。這二十七條中，原文錄入「史記疏證」而改稱「愚按」者十四條。除水澤先生已引錄的「蔡蒙旅平」及「廣陵人召平」二條外現再舉其中三例：

殿本「史記考證」卷五：

十一年縣義渠○臣世駿按，此時義渠不得爲縣。犀首傳云：「其後五國伐秦，陰以文繡千純婦人百人遺義渠君，義渠君起兵襲秦，大敗秦李伯之下。」若義渠已爲縣，秦必更置令長，何至十年之後反爲所敗。「年表」云義渠君爲臣，似可信。

「史記疏證」卷六：

十一年縣義渠

愚按，以時世差之，此時義渠不得爲縣。「犀首傳」：「其後五國伐秦，秦以文繡十純婦人百人遺義渠君，義渠君起兵襲秦，大破秦李伯之下。」若義渠已爲縣，秦必更置令

長，何至十年之後反爲所敗，「年表」云義渠君爲臣，似可信。

這是錄用「史記考證」原文，在前面加一句足其意。又：

殿本「史記考證」卷十二：

少君者，故深澤侯入以主方。「集解」：徐廣曰，進納於天子而主方。一云，侯人主方。駟案：如淳曰，侯家人主方藥者也。○臣世駿按，「封禪書」作深澤侯舍人，此明脫「舍人」二字，徐裴紛紛持疑，未相覈對耳。

「史記疏證」卷十：

少君者故深澤侯。

愚按「封禪書」作深澤侯舍人，此明脫「舍人」二字，徐裴紛紛持疑，未相覈對耳。這是照原文錄用，一字未動。又：

殿本「史記考證」卷二十三：

寢兕持虎鮫鞣彌龍。「集解」：徐廣曰，乘輿車金薄瑯龍爲輿倚較。○臣世駿按，徐廣所云蓋本「續漢書·輿服志」文。劉昭注又引徐廣曰：「繆，交錯之形也。」則字作「繆」不作「瑯」明矣。「索隱」云「瑯然龍貌」，

非是。

「史記疏證」卷十八：

彌龍徐廣曰乘與車金薄，瓊龍爲與倚較。

愚按，廣所云蓋本「續漢書·輿服志」又，

劉昭注文引徐廣曰：「繆，交錯之形也。」則

字作「繆」不作「瓊」，明矣。「索隱」云：

「瓊，然龍貌，音虬。非是。楊倞「荀子

注」：「彌，如字，又讀爲弭。」弭，末也。

謂金飾銜軛之末爲龍首也。

這是照錄「考證」文後，又增加另一資料，以充實「疏證」。這些例子不僅確切地證實了「史記疏證」爲杭世駿所撰，還證實了「史記疏證」成書於「史記考證」之後，所以就據原文有所增益補充。

二十七條中，有三條是省去「臣世駿按」四字，逕將原文錄入「疏證」中，今舉一例：

殿本「史記考證」卷三十一：

諸侯會桓公於甄○「年表」作「郵」。臣世駿

按，「經典釋文」：「甄，音絹，一音眞，或音

旃。又舉然反。或作郵。」

「史記疏證」卷二十五：

七年諸侯會桓公於甄

「經典釋文」曰：「甄，音絹，一音眞，或音

旃。又：舉然反或作郵」「年表」作郵。

其另二條，一爲「考證」卷四「四十二年敬王崩」條下「臣世駿按」之文，「疏證」卷五逕載「按」字下「陸德明左傳釋文曰」一大段。又一則爲卷五「韓趙魏燕齊帥匈奴共攻秦」條下「臣世駿按」之文，「疏證」卷六照錄「按」字下「戰國策補注」原文而未作增改。這就是把「考證」中「臣世駿案」之文作爲「疏證」作者自己的文句逕書之。

可異的是，二十七條中有七條在「疏證」中作「金姓」曰。水澤先生文中述明金姓也是仁和人，與杭世駿同鄉。按，金比杭小六歲（杭1696生，金1702生），後杭九年死（杭1773卒，金1782卒），學術活動同時。於乾隆時以第一人及第的榮譽授翰林院修撰，歷詹事，至禮部左侍郎，中間直講席十七年，位比杭遠爲顯達。但沒有調到武英殿編校經史。他著有「史漢評訂誤」，爲杭氏廣泛引用於「史記考證」中。但在官書中，未寫明其出處，到自己的著作中，就點明了這是當時引用金姓之說。（另有一條稱「邵廷建白」，其人不詳，尙待查）。

二十七條中，有兩條未採入「疏證」中，一是「考證」

卷一一七「溫活人云」條下「臣世駿案，活人，書名，即本草也。溫字疑衍」。一是「考證」卷二二九「渤海碣石不在西」條下「臣世駿按：西下宜有北字」。可能他後來考慮此兩處尚待斟酌，因而刪去未用。

這些就是「史記考證」中「臣世駿按」諸條移入「史記疏證」中情況。

「考證」中更有大量的沒有署「臣世駿按」，也沒有署任何「臣某按」，而逕行考校之文，「疏證」中採用達749條之多，逾「考證」全書總條數之半。大抵一般本校、他校之文，多用此逕行考校方式，而須作理校以及本校他校中須作出判斷或考訂是非者，則加「臣某按」。而在校勘工作中，一般用本校他校的多，所以全書中出現不署「臣某按」逕行考校之文就很多，採入「疏證」中後，加稱「愚按」者達311條，（其中有三十餘條文字稍改或前後有所增益）。現畧舉兩例如下：

殿本「史記考證」卷十三：

差弗生毀渝○「本紀」渝作渝。

「史記疏證」卷十一：

差弗生毀渝。

愚按，「本紀」渝作渝。

又殿本「史記考證」卷六：

六年，韓魏趙衛楚共擊秦，取壽陵。○「趙世家」：「悼襄王元年，龐煖將趙楚魏燕之銳師攻秦葦，不拔。」徐廣曰：「葦在新豐。」今此云取壽陵，所將之師一作衛一作燕，亦不同。

「史記疏證」卷七：

六年，韓魏趙衛楚共擊秦，取壽陵。

愚按，「趙世家」：「悼襄王元年龐煖將趙楚魏燕之銳師攻秦葦，不拔。」徐廣曰：「葦在新豐。」今此云取壽陵，所將之師一作衛一作燕，亦不同，豈有二事耶？

所有311條中，有像例一將原文一字不動照錄而加上「愚按」二字的，也有像例二加「愚按」後於原文末尾加一句兩句使意義更較妥的，更有比原文增多了很多字句的這種為數也不少。

還有一種情況，就是不加「愚按」二字，將原「考證」中逕行考校之文照樣移錄入「疏證」書中的。這比加「愚按」者更多達392條，現也舉兩例：

殿本「史記考證」卷一：

青陽降居江水。○「大戴禮·帝繫篇」作「降

居泝水。

「史記疏證」卷二二：

青陽降居江水。

「大戴禮記·帝繫篇」作「降居泝水。」

又殿本「史記考證」卷二二：

有男氏○「路史國名紀」曰：「世本」之有男氏，

「潛夫」作南，「周書」之有男也。

「史記疏證」卷三二：

有男氏

「路史國名紀」曰：「世本」之有男氏，「潛夫」

作南，「周書」之有男也。二臣世均爭權而

分「楚地記」云：「漢江之北為南陽，漢江

之南為南郡」者是。

所有32條中，像這樣照原文採用以及稍加文句的不少，

還有不少加了更多的文句，但其原文必錄為該條的主要

中心。

在這749條逕行考校文中，還有46條則用了在「考證」

中原未提明的所引用原書名或原人名，於是「疏證」文

中遂有程一技的「史銓曰」，或「金姓曰」等，凡達九人

之多。也當是在官書中未及詳細舉出，到自己著作中，

就把原所引用出處交代清楚。

由上述這一不署任何「臣某按」的逕行考證之文這

樣大量照錄入「疏證」書中，和「臣世駿案」一樣改稱

「愚按」或省去「愚按」，那麼就可使我們知道「考證」

中的這些逕校之文，也都是杭世駿的手筆。應是無疑的。

當時杭世駿與齊召南同為博學鴻詞錄取的名士，為

武英殿校刊二十一史的首選和骨幹力量。（鴻博錄取一等

五人二等十人中，除尚有二等的周長發也參加校刊二十

一史然迄無聲聞外，主要就是杭、齊等人膺編校重任）。

我們看「漢書」全書各卷的「考證」，大都是「臣召南

按」，而「漢書」卷末作為考證工作完成的識語，也由齊

氏署名為「臣召南識」。就可斷定「漢書」當由齊召南負

責。經查閱「清史稿·齊召南傳」，果然載明：「時方校刻

經史，召南分撰『禮記、漢書考證』。由此可推知當時各

史，都必由一人「分撰」，即分別為各史的校刊負責人。

那麼杭、齊二名家分別擔任「史」「漢」二部首要史籍，

是事理之必然的。可是後來杭氏在所謂求骨鯁之士的馬

周陽城試中，以直言得禍，放逐歸里，以致他作為「史

記」考校工作負責人的主要成就被抹殺，不能像齊召南

那樣明載在史籍中，就連書末作為考證工作完成的識語

也不署他的名，而改署校刊二十一史「總裁」張照之名

而且很有可能，「史記考證」中的「臣世駿按」那麼少，不過二十幾條，大多數都為不具名的逕校之文，而不像「漢書考證」中那樣絕大多數條文都署「臣召南按」，顯然也是大量被刪去了世駿之名，下面還要提到，大量改署張照之名，當也是同一原因。現在發現這許多不署杭氏之名的條文大都被杭氏收入自己的著作「史記疏證」中，而且特意標明「愚按」，顯然是他不甘心自己這許多心血成果被抹殺埋沒在官書中吧。

不僅是那麼多不署名的逕校之文是杭世駿手筆，連書中署名的幾位達官「按」的條文也當出於杭世駿的代筆。其中主要的一人，就是上面剛提到的作為「校刊二十一史職名」中任首位「總裁」的刑部尚書張照。他以尚書之尊，領總裁官銜，當然不可能和翰林們一樣伏案寫「考證」。但既當了此項工作的總裁，對皇帝總要表示會親自參加工作，所以也要在「考證」中出現「臣照按」

之文，就只好由本史的負責人代寫。北京圖書館善本室藏有一部「史記考證六卷清張照、杭世駿等撰，清吳氏金竹山房抄本，二冊」。大家都知道一種事實上的通例，凡與達官碩望連名撰著某一部書，那位達官或碩望只是掛名，實際執筆撰寫的必是那位名望較次較低的人，那麼這部「史記考證」之由杭世駿執筆撰寫，由這裡也足以

知其為無疑的了。更何況本書還有特殊情況，即上文提到的杭世駿以直言得禍，很多「臣世駿按」字樣顯然被刪去，連書末談考證工作完成的識語也改用「臣照謹識」，那麼他的許多考證改用「臣照按」也就不可避免了。全書中「臣照按」達170條之多，超過勉強留下的廿多條「臣世駿按」六倍多，這是非常不合理的。顯然170條中，除原由杭氏代筆者外，必有不少是由「臣世駿按」改書的。所以杭氏終於把許多「臣照按」之文收入自己的著作「史記疏證」中（見下文），而且更乾脆把「考證」全書收入自己的全集內，成為「道古堂外集 史記考證」七卷，這等於後世所說的保護自己的著作權了。由這點更明白無誤地肯定殿本「史記考證」實際是由杭世駿所撰寫的。

在「史記考證」全書中多達170條的「臣照按」之文，採入「史記疏證」中改稱「愚按」者59條。這就是五十九條鐵證證明「臣照按」之文皆杭世駿所撰，因為上文已知「史記疏證」為杭世駿所撰是無可移易的。此外去「臣照按」三字選用為「疏證」文者14條，一如原未署「臣某按」的逕校之文採用方式一樣。另外還有34條改稱「金姓曰」，顯然是在標為「臣照按」的文中杭氏原採用了金姓「史漢評訂誤」材料而未出金氏名，也是到自己著作中才說明其出處。另還有改稱徐孚遠、邵廷遠、余有丁諸人曰

及品祖謙「大事記」曰的少數幾條，當與改稱「金姓曰」同。其未採用者57條，其中可能有張照授意杭世駿寫，或據張照有關這些條之的意見寫，因為張照也是讀書之士，不過偏於法律、樂理之學，不能說他對「史記」無自己的意見。因而杭世駿不採入自己的著作中。當然其中亦必有自己原代為撰寫而像「臣世駿按」未採用的兩條一樣，由於自己的看法有了改變而不採用的。

還有代其他達官撰寫的幾條，一是為校刊二十一史「提調」第一名的陳浩代寫的「臣浩按」，一是為任「提調」第四名的孫人龍代寫的「臣人龍按」，到「疏證」中都改為「愚按」。又為校刊二十一史「總裁」第二名李清植代寫的「臣清植按」，到「疏證」中去李清植名選作為疏證文。此時不僅杭世駿代人執筆，和杭同在一起的王祖庚也為一位與和碩和親王連街上奏表報二十一史校刊完成的吏部右侍郎德齡代寫「臣德齡按」，在「疏證」書中，杭世駿把它如實地改寫為「華亭王祖庚曰」。

不僅為達官代筆，即親密共事的同僚也會代筆。如「史記」全書「考證」中有「臣祖庚按」者七條，其中有三條入「疏證」中改稱「愚按」，顯然是杭世駿原代王祖庚撰，或共同切磋研討由王據杭之意撰。另一條則作「金姓曰」，有三條案而未用，則顯係王氏所撰，又全書「考

證」中，有「臣召南按」共28條，其中有二條錄入「疏證」中改稱「愚按」，亦可知杭代齊撰。而採入「疏證」中稱「齊召南曰」者八條，可知凡確為某人所撰的「臣某按」，則「疏證」是不沒其名的。另不出齊名而選用者一條，原文當亦杭氏所撰，又改稱「金姓曰」者一條，「史詮曰」者二條，當係原文引用此二家之說。而棄未採用者十四條，當亦齊氏所撰。這些又為參與杭氏所負責的「史記考證」學者有關條文採用入「史記疏證」的情況。

這情況也見於由齊召南負責撰寫的「漢書考證」中。「漢書」全書的「考證」中，本來絕大部分都標明「臣召南按」，不署名而逕校之文相對來說很少。有的卷全部署召南按而無一逕校之文。可是全書中也往往出現「臣照按」，其次「臣宗萬按」（總裁，第四名刑部右侍郎勵宗萬）、「臣浩按」（提調第一名侍讀學士陳浩）等，但條數都不多。（臣照較多）。說明齊召南也不能不應付一下這些達官。此外還有天文星歷專業方面的「臣永祚按」（欽天監博士張永祚）。而「臣世駿按」也會偶見（如卷二十一下，卷二十八上）。據「清史稿·齊召南傳」，載他分撰「漢書考證」時，正以父喪去官，乾隆「今即在家撰進」。這部獨自在家撰寫的「漢書考證」都是這樣要把別人名字寫進去，那麼杭世駿在殿閣寫的這部「史記考證」，更可想見不可

避免要雜入許多他人的名字了。

最後杭世駿如實地把自己寫的「考證」都轉載入自己個人的著作「史記疏證」中，見出一個學者的苦心。綜計殿本「史記」全書的「考證」共1482條，「史記疏證」採用者共達967條，約達全書總數的三分之二。可見杭氏儘量多地運用了自己在「史記考證」中撰寫的成果。也就證明了這部殿本「史記考證」官書，是由杭氏辛勤努力所撰成，所以他才把其成果大量收入到自己的個人著作中。

一九九〇年九月初稿

本稿の筆者、劉起釭教授を紹介する。

劉起釭教授は、一九一七年三月九日生れで、現在、

中国社会科学院、歴史研究所の教授(中国古代史専攻)である。兼ねて、中国殷周文化学会理事、中国孔子研究会顧問である。

主な履歴と著書を挙げれば、

履歴

一九四五年七月 重慶国立中央大学(現南京大学)

一九四七年八月 文学院歴史系卒業

一九四七年十月 南京国立中央大学文学部研究生

一九四七年十月 修了(文学博士)

一九四八年 春 南京国史館助修(講師)

一九五一年二月 南京国史館協修(助教授)

国史館が中国科学院南京史料整理処に改名、前後して整理組長、

資料匯編組長(助教授待遇)となる。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 北京の中華書局編輯(助教授待遇)へ転任

一九七六年二月 中国社会科学院歴史研究所へ転任

一九七九年

中国社会科学院歴史研究所研究員兼研究生院教授(現在に至る)

業績

一九八五年 『尚書評述』 齊魯書社より出版

一九八六年 『顧頡剛先生學術』 中華書局より出版

一九八七 『尚書源流及伝本考』 遼寧大学出版社より出版

一九八八年 『春秋三伝及国語之総合研究』 巴蜀書局と香港中華書局より出版

一九八九年 『尚書学史』 中華書局より出版

『史記夏本紀注釈今訳』 が『史記注訳』に収録され中華書局より出版

一九九〇年 『古史統辨』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より出版

上記の著書のほか、古史に関する論文を各雑誌に四、五十篇発表

長年、顧頡剛の下に在ってその薫陶を受けたので顧頡剛史学の依鉢を継ぐものとして著明である。「尚書」

学が専門で三年前に東大、京大より「學術振興会」を通じて招聘されて来日、各大学で中国古代史学に関する

版

版

版

版

版

版

版

る講演を行った。

標題の「史記疏證」六十九卷は、数奇な運命を負った珍しい書物である。清末、宋元の善本および名抄本を含む十萬卷樓主人として著名な蔵書家、陸心源の蔵書が、明治の末、売りに出され、日本の岩崎がこれを買収、一九〇七年舶載され静嘉堂文庫に納まった。

その中に、乾隆の碩儒、杭世駿の「史記疏證」六十卷があつた。ところが「史記疏證」には、清・沈欽韓の著三十六卷があつて世に知られてゐた。静嘉堂の目錄を作る際、杭世駿の「史記疏證」は著者名が無かつたので、合抄して一緒になつてゐた「漢書疏證」から沈欽韓の著と速断して、しかも合抄を合刊と誤つてしまつた。かくして約一世紀静嘉堂の秘庫に眠つてゐたことになる。

杭世駿は武英殿本史記を校訂したがその「史記考證」は各巻の巻末に附されているが、量的に余りにも寡いことが、かねて気になつてゐた。「史記考證」の単行本は「食舊堂叢書」に七巻載つてゐるが、僅かに第十四、十五、兩冊のみにすぎない。

この度、杭世駿の「史記疏證」六十巻が陽の目を見るに至つたことは、之により、杭世駿の史記説を通し

て、最近とみに起こりつつある清朝考證学の一般を闡明する一大關鍵を得たことにならう。

三年前に劉起釡教授が来日した際、「十萬卷樓舊藏、静嘉堂文庫藏『史記疏證』著者考」(文科大学国文第六号、昭和六十二年三月)を呈し、批正を乞うと共に、顧頡剛旧蔵「史記疏證」の所在を尋ねたところ、劉起釡教授来日中に、北京の社会科学学院の歴史研究所に在ることが判明、水沢と劉教授と共同研究を約し、劉教授は文科大学言語文化研究所の客員研究員となつた。劉教授は帰国後、北京図書館にも一本あることを発見、本稿とともに、静嘉堂本と顧氏旧蔵本との校勘記も送つて来られた。本紙には紙面の都合で本稿のみ掲載することとなつた。

(水沢利忠)